

沉稳持重 着意求新

——序孙党伯同志的《中国现代两大文豪论》

陆耀东

我和党伯同志相识已30多年。60年代初,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时,我们开始共同切磋学术。文化大革命后,我们成了知己。他治学严谨,重水磨功夫,不轻易将论著问世。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是《郭沫若评传》。论答辩通过后,刘绶松先生等都认为可以发表,但他没有寄出去。文化大革命后,我和其他同事几次催他早日完成这部专著,他用了整整10年时间,到1987年才将书稿送请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此书发行后,在学术界普遍受到好评。

我认为,做人应以实事求是为主臬,学术研究当奉科学性为上帝,不能轻率跟“风”。指鹿为马,斥是为非,不管打的是何种神圣旗号,用的是怎样至美的言辞,也不能不受到学术本身的惩罚,难以得到学术界同人的谅解。党伯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颇受重视,被调到省里工作,但不久他见武汉大学中文系同事中60%以上的人被罚劳动改造,便愤愤不平地提出异议。结果自然是厄运君临。对有些并不涉及国计民生的学术问题,党伯同志也是如此。如郭沫若同志1928年用杜荃的笔名发表的《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》一文,过去,人们为贤者讳,不曾说出作者。而党伯在70年代末就在课堂上对学生讲:这肯定是郭老所写。近10余年来,他是编辑《闻一多全集》(十二卷本)的主要负责人之一,主持注释《鲁迅全集》中的《热风》,参与编辑、注释《郭沫若全集》等,为了核对原文,校勘版本,查觅史料,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。闻一多先生的未刊稿《真我集》,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第一次将其中的11首收入《闻一多诗集》出版,功不可没。然而,党伯同志经过校勘,发现《闻一多诗集》中这11首诗从标题到字句、标点符号、错漏及衍文共计152处,其中诗题严重错误一处,漏一行诗的一处,同一首诗将其中几行另起独立为一首的一处,错得最多的《志愿》,计36处。工作粗细不同,成果质量有天壤之别。有一段时间,我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不重视版本问题,影响了研究论著的质量。就郭沫若研究而论,由于对《女神》各种版本缺乏了解,许多研究论著失去了存在的价值,即使楼栖先生这样著名的诗人和学者的并非粗制和泛论的专著《论郭沫若的 诗 》中,也留下了遗憾。书中说,《匪徒颂》“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:诗人对‘鼓动’阶级斗争的马克思、恩格斯和‘实行共产主义’的列宁作了热烈的歌颂。”实际上,初版本的《匪徒颂》,并未提及马克思和恩格斯。1928年作者修改时,才将原来写的罗素、哥尔栋去掉,换上马克思和恩格斯。这样,对郭沫若同志“五四”时期写的《女神》的论断也就落空了。俗话说,于细微处见功夫。党伯同志不忽视这些所谓细微末节处,因此,他的论著中无“硬伤”,且给人以厚实之感。

至于学术观点和具体论述,党伯的论著似乎象唐弢先生肯定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时所说:沉稳持重,有特色。不着激烈之词,不作偏激之论,但力求在前人和同时代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突破,这是收在本书中大多数论文的共同特点。鲁迅研究方面,如《论“五四”时期鲁迅的进化论思想》,就纠正了某些历史书和哲学史著作的误断。有的历史书说,慈胥黎的《天演论》,“用生物的自然竞争来代替社会阶级斗争的观点,本质上是反动的,它为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扩张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”。有的哲学史著作说,《天演论》的下半部“把生物的科学原理错误地套用到社会领域,是反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”。党伯同志仔细研究了严复译的《天演论》和别的译本,发现《天演论》并非如上述论著所说。《天演论》明白地说:“人择之术,可行诸草木禽兽之中,断不可用

诸人群之内”；“把进化原理应用到人类社会来的严格的科学方法，是很难用于实际的政治领域的”。党伯此文还指出：《天演论》认为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有两种法则，一是如同生物界一样的生存竞争、自然选择的法则，这是宇宙过程；一是人的道德、情感、思想、良心的进化，即伦理过程。在人类社会初期，宇宙过程占支配地位；社会愈进化，伦理过程所起的作用愈大。鲁迅“五四”时正是因为对赫胥黎的这一观点有同感，所以特别强调改造国民性、民族“根性”的重要性。这一观点，是《论“五四”时期鲁迅的进化论思想》的独特贡献之一。又如《关于郭沫若和泛神论的关系问题》一文，研究的是几十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，此文通过细密的分析论证，说明郭沫若的“泛神论”并不是真正的泛神论，至少不是原本意义上的泛神论，或是不完全的泛神论，而是经过他主观解释的郭沫若式的泛神论。对老问题提出了新见解。

学术事业的发展，学科的发展，有赖于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发现新的重要资料，有赖于不断地提出新的或更科学的见解，不断在局部或整体上提高学术水平。人云亦云、重复前人的见解，是最易作到的，但学术事业也就停滞不前。而要提出真正的新的学术观点，则是十分艰难的。恩格斯说：“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，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，因为很明显，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，只有靠大量的、批判地审查过的、充分掌握了的历史资料，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。”（《卡尔·马克思〈政治经济学批判〉》）我钦羨在学术上多有创见的同志。至于在学术园地花丛中纵野马的人，我认为他们不仅对学术事业发展的规律无知，而且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。

党伯同志治学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，在文学研究中，是从“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”出发，注意文学现象产生的文化背景，注意种种非文学因素对文学的影响，注意特定历史环境和作家的特殊情况，与此同时，更注意从美学的角度对文学现象进行研究。他在《中国新文学大系（1937—1949）·诗卷》的《编后记》中说：“我们坚持的选诗标准是：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。既要注意诗歌的时代性、战斗性及其在当时产生的社会影响，也要注意它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。诗首先必须是诗。同时，还要注意题材、风格、流派的多样性，以及地域和作家的代表性。”这里虽然是谈选诗标准，其实也可看作是他研究诗及其他文学现象的原则。应该说明，采取这种观点和方法，是我国五六十年代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大多数学人的共同特色。一般而言，从历史的观点出发议论文学现象较少风险，而以美学的观点品评则易于受到“左”的方面来的非议，尤其是对待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以外文学流派的作品，有的人似乎欲置之死地而后快。所幸党伯的文学研究成果，迄今尚未受到攻击。我想，这大概也和党伯同志治学“沉稳持重”有关。他的某些评议，往往采取“春秋笔法”。读者如仔细阅读，可知道其分量；如匆匆扫瞄，则不易领会其真正含义。

我的这些肤浅的看法，不知读者朋友以为然否？